

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理论建构

肖贵清,刘世辰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传承发展中华文明、构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需要科学理论部署与正确方法论指引。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应用于实现中华文明现代更新的实践:一是立足中华文明的整体性以把握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历史脉络和结构特征,从古今中西的角度阐明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理论内涵;二是构建中华文明现代更新的动力机制,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建设的互构逻辑;三是将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视作生成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塑造其标识性特征,指引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构建。三者有机统一,构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理论之维。

关键词:中华文明;理论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3-0067-10

构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推动中华文明再现荣光、使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①中华文明现代形态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践进程的发展而得以建构,迫切需要理论规划与方向指引,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彰显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中国共产党整体把握中华文明现代形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联通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巩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实践基础,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汲取世界文明精华;通过深入研究文明更新发展的动力源泉,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两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文明更新的文化条件;通过准确提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征,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并昭示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一、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整体性

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传统文明的现代更新,是“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是对人类文明精华的吸收借鉴。中国共产党以大历史观的视角研究并阐释中华文明内生演进脉络及现代文明形态生成的历史逻辑,将历史长河中积累下来的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反映中华民族生产生活实践的思想理念及价值观念作为文明更新的历史资源,并通过“两个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具有深厚的历史纵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了文明要素的有机聚合、文明结构的协调统一,使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具有均衡的结构层次。同时,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同资本主义文明共处现代文明的时空场域,需要在东西文明互动、中外文化交融中汲取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一) 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传统文明的现代更新

今日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来自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传承。宽广的历史视野、独特的历史智慧和深厚的历史情怀促使中国共产党善于继承历史的积淀作为今日的资源、继承历史的规律谋划未来的发展。传承发展中华文明,“传承”意味着古今贯通、古为今用,“发展”意味

收稿日期:2025-01-12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SCJJ24ZD01)

作者简介:肖贵清(1959—),男,河北灵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着必须实现现代转型,使传统文明要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节奏。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既定条件。第一,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历史必然。近代以降,外族入侵和内部动荡加速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在中华文明近代蒙尘的背景下,对于如何实现中华文明现代更新的讨论层出不穷,涌现出一批文明建设方案。“中体西用”思想、“尊孔复古”的文化复古主义、“全盘西化论”等观点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思路,却无法根本上扭转中华文明危难局面,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皆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俄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成功实践昭示了作为“第三新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接受,满足了文明转型的现实诉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实践印证了中华文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①,传统文明要素经由马克思主义改造而成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历史性来源。

第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传统,使其具有深厚历史纵深。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学理概括阐释了中华文明内在结构的稳定性和适应历史实践的创新性,体现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民族性特质。就具有突出连续性的中华文明而言,历史上社会形态的变更会暂时解构文明结构,但文明要素之间链接的切断并不意味着文明的覆灭,而是成为新文明结构生成的必要材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更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建构的起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和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理念经由马克思主义改造而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资源。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走来的社会主义,“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②。另一方面,历史证明中华传统文明脉络只有经马克思主义激活才能重现荣光,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更新发展。

第三,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将其应用于开辟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新的历史实践。毛泽东从中华文明延续性角度看待今日发展:“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③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④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衰更替承载中华文明长时期的历史发展,既积累了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的治国理政成功经验,也埋藏着社会动荡、文明蒙尘的深重教训,能够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提供文化滋养、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历史经验借鉴。马克思恩格斯曾对人们创造历史的条件进行论述:“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⑤继承历史是创造历史的前提,创造历史是继承历史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历史观贯通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将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纳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将中华文明的理想追求融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构想,彰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使命担当和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历史自觉。

(二) 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

文明是一定区域内的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系统性概括,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文明嵌入世界文明图景之中,在遵循现代化普遍原则的同时彰显中国特色,统筹推进中华文明各要素之间协调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认识到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资本主义文明推动生产力跃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系统的失衡:经济领域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及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政治领域代议制民主的虚伪与政党争斗;文化领域内拜金主义盛行及人民精神空虚;社会领域不可避免的工人失业及社会治理混乱;生态领域严重生态环境危机

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

②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及污染治理的不作为,无不证明资本主义文明是在它不断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则协调推进文明结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使各得其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促使中国共产党对文明结构的认识趋向系统全面。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明确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导向,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党的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命题,要求“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文明建设布局“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②。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使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构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结构均衡而完整、要素协调且全面。

在经济建设方面,重视生产力发展对文明形态跃升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实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任务“把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建设社会主义,直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全部社会变革、社会实践活动,历史地贯穿和统一起来了”^③。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以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④,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赋能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建设。

在政治建设方面,“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⑤。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民主实践的全过程,享有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权利,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人民性、人民政治性和文明主体性的统一,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在文化建设方面,锚定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和生命更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和鲜活内容,服务于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现实需要,使中华民族能够在世界格局变化中掌握主动、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在应对人类挑战中引领发展。

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是构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内在要求,对富足、安定、和谐社会状态的执着追求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中,是中华文明理想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通过有效的制度体系平衡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之间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⑥。不同于西方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我们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创造良好自然生态条件。

“五位一体”的文明建设方略促使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实现要素协调聚合和结构完整均衡,超越了西方现代文明偏重物质文明发展而造成的社会结构失衡的现代性弊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历史主动精神。

(三) 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对人类文明精华的吸收借鉴

文明创造这一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必须立足现有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能够逐步

①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②《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6页。

③《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页。

④刘文祥,赵庆寺:《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与实践要求》,《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⑤《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⑥《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中华文明现代形态作为生成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和走向共产主义阶段的路途上,以独特的和平性基因和开放包容的胸怀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批判性的眼光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东西文明互动、中外文化交融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建设服务^①。

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塑造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突出特征。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来充实自身、推动现代转型,是因其具有突出包容性。历史已经证明,文明只有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获得生机与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②,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交流互鉴,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彰显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突出特性。

现代化的浪潮将民族历史连接成世界历史,将文明孤岛联通成命运共同体,“现代文明”规定了中华文明同资本主义文明共处的时空场域,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近代中国对于西方文明的借鉴学习走过了技术模仿、制度变革、文化探赜的求索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为中华文明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提供科学方法,指引中华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获得现代性。毛泽东确立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强调“立足实际,批判接受”,主张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之处并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学的是“基本理论”,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③。改革开放是一次思想解放,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关起门来、故步自封难以赶上现代化潮流,于是提出经济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借鉴市场经济经验,在文化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④,同时坚守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四项基本原则”,同资本主义的腐蚀性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借鉴各国现代化成功经验、遵循现代化普遍特征的基础上塑造中国特色的过程。顺应全球化潮流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法治化进程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顺应民主化要求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先进技术交流而又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基本原则、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注入新的动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广博的文明视野和包容的文明胸襟推动绘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通过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文明实践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文化滋养,同时也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

二、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生成机理

中华文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而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越,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而不断获得现代力量。中国共产党遵循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实践基础,以正确处理“古今中西”关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汇聚“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力量以创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一)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存续发展的实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孕育形成的本质特征、原则要求等内容的高度概括,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实现了中国特色和普遍特征相统一,明确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原则与方向。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中华文明现代更新的物质基础。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从“四个

①秦龙,杜森:《中华文明和平性的观念基础》,《理论探讨》2024年第5期。

②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页。

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概念的演进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一种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紧迫感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将实践中的现代化道路定义为“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②并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小康社会建设目标联系起来,“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③。可知“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情况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点呈现,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体现后发国家自力更生追赶现代化潮流的奋进精神与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得以进一步深化,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追赶模式跃升为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独特风格的体现,由一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视视角转换为“和而不同”的平视视角,更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④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中华文明现代更新的制度保障。社会制度是保障社会在特定形态下正常运行的系统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文明成果,涵盖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环节,为中华文明的现代更新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设想链接了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列宁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以此链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文明进步,“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⑤。中国共产党从现代化的角度理解“高度的文明”概念,并围绕构建现代制度和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着“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突出以深化制度改革、强化制度建设引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致力于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更好地保障中华文明的现代更新,创造了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形态。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孕育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和题中应有之义。近代以来,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文化生命体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解体,中华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甚至陷入“文化窒息”的境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中国化发展逐步扭转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领域的被动局面,经由“两个结合”逐步构建起新的文化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科学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民族性;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基础,不断汲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将其转化为新的理论成果,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生命力。

(二)“两个结合”破解文化维度“古今中西之争”

“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⑥“中西古今之争”乃中华文明转型路线争鸣在文化领域的突出体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分析框架,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中外、贯通古今,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辩证的思维超越了将古与今、中与西对立起来的直观逻辑。马克思主义中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⑤《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0页。

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使得“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方向、方法和观点指引。领导力量之维,明确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肩负着破解“中西古今之争”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文化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汇聚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破解“古今中西”百年争鸣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③

文化方法之维,坚持“两个结合”,强调“立足实际,批判接受”,使之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毛泽东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宝贵遗产、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的关键、是民族自信的来源,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区别、批判和利用;坚持鲜明的中国化的立场和中外一致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学习西方文化的先进之处,有机地结合中外文明成果。邓小平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④。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特别强调“第二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实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广阔的文化资源,巩固文化主体性,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文化观点之维,在“古今”问题上,一是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二是积极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资源,实现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在“中西”问题上,一是指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二是讲好中华文明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在推动交流互鉴中融通各种资源,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将其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持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三是论述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历程及其对世界文明的积极贡献,破除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把中国看作是近现代民族国家的狭隘观点。

(三)“历史创造者”书写中华文明新篇章

“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⑤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传承发展中华文明,需要正确认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之内涵,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的理论意蕴。习近平总书记以唯物史观的视野看待人民的重要地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江山”“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凸显人民是文明传承更新的主体力量。

“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⑥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作用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群众路线,激发人民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⑥《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117页。

群众首创精神。首先,大兴调查研究以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之“的”,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毛泽东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到习近平总书记“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的论述,以及对于调查研究的贯彻落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正确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居高堂之上空想出来的结果,而是从上到下在实践经验中得出的理论结晶。其次,通过优化制度设计、畅通反馈渠道激发人民群众踊跃建言献策的积极性,“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改革设计中来”^①。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宝贵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宝贵资源,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整合优化为政策目标。第三,准确把握人民概念内涵变化,了解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激发其社会参与欲望,进而凝聚共识、提供平台、开拓空间,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的统战价值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强调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推动现代化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带来的异化问题:片面注重资本的增殖而忽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只是存在于资本这一生产关系中的推动资本增值的活跃因素,资本仿佛成为文明运转发展的推动力量。社会主义文明在生产方式上根本改变资本至上的逻辑,消除资本造成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它是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人的现代化”目标由“生存型个体”向“全面发展主体”跃升,需要在“物的极大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动态平衡中构建新型文明。在能力塑造方面,中国共产党以科技、教育、人才的一体化战略实现劳动者现代化素质更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③,并谋划三者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实现理论创新和战略更新。在文化引领方面,在“根脉”“魂脉”的互动中构建精神文化生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华文明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在社会保障方面,着眼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④。不断加强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夯实民生福祉的制度保障,推动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

三、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标识性特征

西方现代文明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之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文明转型路径改写为内生演进范式,根本上突破原有现代化理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依托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塑造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样态,又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构想的共产主义文明图景,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以新质生产力为发展支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

(一)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理论,自觉承担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着眼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主动强化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使命担当;着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基本矛盾发展调整战略目标,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奋斗方向,将人民的实践力量凝聚、组织、引领而汇聚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动力。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4页。

②《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3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44页。

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4页。

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理想指引着仁人志士探索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行路径,而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指引人类文明前进。孙中山经过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深刻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层面的契合性,认为共产主义文明预示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夫苏维埃<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①。李大钊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出发,认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东西文明优势结合而形成的“第三新文明”^②,俄国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践就预示了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共产主义文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呈现,中华文明现代结构中的社会主义元素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断巩固的同时,不可避免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③,存在内外部因素的干扰,因此需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列宁指出:“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④无产阶级政党是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推动文明更新发展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领导地位的巩固和加强,激发其推动中华文明进步发展的历史自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中流砥柱”与“坚强的核心”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党领导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全面性,“党是领导一切的”^⑤。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的基础上,探索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中华文明现代更新的实践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厘清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⑦,使党的领导制度位于国家制度体系最具统领性的地位。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孕育形成的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从领导力的角度彰显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规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属性,保障中华文明的平稳传承和发展。

(二)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将生产力理论束缚于纯粹经济领域的藩篱,将生产力概念引入到社会历史范畴中考察。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生产力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基础因素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⑧,能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判断文明形态先进与否的根本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跃升奠定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实践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质态”^⑨。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高质量发展和生产力质变提供理论指引。

第一,新质生产力凸显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改变“活劳动”对“死劳动”的依附关系。科学技术“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⑩。劳动者本是

①《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页。

②《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页。

④《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⑦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⑨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但资本主义科技进步和大工业的发展却造成了劳动者的在场消失,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①,甚至在科技进步的时代潮流中被迫让渡自身劳动主体地位,依附于机器大工业。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实现劳动者的解放为价值旨归,新质生产力推动劳动者生产主体地位的复归。首先,根据时代发展需要推动劳动者知识结构转型升级,激发创新能力以提升生产要素组合优化的效率和质量;其次,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载体的智能化设备和高端装备的广泛应用及无人车间、智能装载、工业机器人等生产工具的创新发 展,体现了劳动者脑力劳动的智慧结晶,彰显了人的本质力量,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减轻了“活劳动”对“死劳动”的依附,推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劳动者解放。

第二,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要素多元维度的跃升和质性效率的全面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之“新”并非是生产环节中单一纬度的跃升,而是新的生产要素的迸发和生产要素组合配置的优化,全面超越了传统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和生产效率。首先,在生产要素组合配置方面实现创新,推动数据、信息、知识、资本等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次,依靠科技创新扩展培育新的生产要素的范围,推动劳动对象范畴突破物理限制向虚拟领域拓展。虚拟资产、知识资源等更多非物质性元素进入劳动对象考察视野中,使得新质生产力容纳更多新质生产要素,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支撑力。

第三,新质生产力提高了人与自然实现物质变换的效率,展现了文明更新的全新路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摆脱“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最终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归根到底源于自然界,“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②。资本主义文明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机器大工业带来生产力的跃进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畏惧、克服了对自然的依赖,但使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沉浸于对自然的征服,在人与自然并不合理的物质变换方式下,“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体现为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新质生产力引领科技创新以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自然力”向“社会劳动力”的转化效率,摒弃了从自然中掠夺资源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道路。

(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和“真正的共同体”的设想,以人的自由发展 as 基本特征和价值旨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追求“小康社会”的社会理想和“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透视出中华民族对于人的解放的探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构思的“第三新文明”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命题,始终贯穿着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执着追求。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制约着社会的表现形式,决定着社会发展面貌,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稳步、渐进、协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文明演进的历史谱系中,价值目标的设定始终与社会性质的制度选择构成深层互构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生,本质上是对西方现代文明范式困境的突破性回应,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文明维度上的集中显现。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核心任务,以五大突出特征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基点和价值取向,涵盖个体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文明现代化模式的先进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孕育而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价值目标层面,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终极目标,超越西方现代文明资本逻辑上社会成员不可避免的“被物化”状态;在价值本体论层面,体现为“真正联合体”的自由对市民社会孤立原子个体的超越;在价值立场层面,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资本逻辑牢笼,消除西方现代文明由物的依赖性而衍生的社会弊病,以一种超越性实践展现文明范式的跃升。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要求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中华文明所承载的基本理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大同社会”理想目标象征着中华民族朴素的社会美好愿景,但传统文化社会构想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礼规制下的社会有序运行,按照等级尊卑秩序获得应有社会财富并各得其所,公平理想建立在不平等的等级差别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使中华文明社会理想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两个结合”,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平衡、不充分的生产力发展现状,为推进共同富裕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持制度基础。着眼生产力发展实际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根本要求,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物质和精神协调”“效率和公平兼顾”“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统一”,渐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朝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前进。

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同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内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构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理论之维,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承发展中华文明提供科学理论指引。作为生成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现代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同中华文明的深层互动、马克思主义“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深度结合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和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不仅联通了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且丰富了世界文明的百花园、昭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XIAO Guiqing & LIU Shiche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ory precedes action. To inherit, develop, and construct the modern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 scientifically ground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are indispensab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implemented the Marxist theory of civilization into the practical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ough three integrated dimensions. First, by anchoring in the holistic continu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structural attributes of its modern formation, articulating its theoretical essence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lens that bridges antiquity and modernity, as well as Chinese and global civilization perspectives. Second, it constructs a driving mechanism for civilization renewal, decoding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shaping the modern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rd, it delineates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an emergent paradigm within the broader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se three dimensions form an organic unity, collectively constituting the theoretical architecture for the modern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责任校对 葛丽萍)